

# 1920 年代日本侵華史研究評介\*

陳太勇

[提 要] 關於 1920 年代的日本侵華史研究,日本學界雖然做了大量實證研究,但因史觀限制與政治影響等因素而存在諸多缺陷,學術政治化現象較為嚴重,在檔案使用上時有選擇性與片面性,不時以“實證”為幌子來歪曲和篡改歷史,從而形成了辯護式與迴避式並立的二重研究範式。這一範式所構建的歷史認識與評價尺度能否進行理性的歷史闡釋,尚需考證。英美學界並無日本侵華史的專題研究,現有成果主要以大國間的外交互動與在中國問題上的協調為研究對象,宏觀考察尚可,微觀實證不足,對華盛頓體制的殖民性質與帝國主義性質缺乏深刻反思。國內學界因研究人員不足及史料欠缺等諸多原因,迄今尚未系統利用日本軍政兩界的原始檔案展開深入的實證研究,僅利用日方的片段史料及中方文獻進行過零星散碎的個案研究,支撐史料不足,缺乏說服力。

[關鍵詞] 1920 年代 日本侵華史 微觀實證 宏觀考察 歷史闡釋

[中圖分類號] K2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183-11

1920 年代是日本全面侵華的準備期,該時期的侵華史研究對於 1930 年代全面侵華史及抗戰史研究而言,無疑是一個重要補充,對探討 1930 年代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原因、準備及國際環境等均有特殊意義,也可為學界瞭解日本軍國主義崛起後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軌跡及中日關係的發展進程提供重要參考。本文就日美英學界及國內學界對 1920 年代日本侵華史的實證研究與宏觀考察進行系統梳理,擬構繪一幅該時期日本侵華史研究的全面圖景,但亦無法將國內外的相關成果鉅細無遺地逐一評價,挂一漏萬之處,尚期方家指正。

## 一、日本學界二重實證研究範式的形成

### (一) 戰後辯護式實證研究範式的興起

明治維新使日本邁入了近代化的門檻,西方的蘭克實證主義史學也隨之被引入日本史學研究的各個領域,被實證主義史家奉為圭臬,用永原慶二的話來說就是“明治以來史學研究的主流便是

\* 本文係 2018 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戰間期日本侵華軍政檔案的整理、編譯與研究(1919~1931)”(項目號:18BSS036)以及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 65 批面上資助項目“戰間期日本侵華政策研究(1919~1931)”(項目號:2019M653459)的階段性成果。

實證主義”<sup>①</sup>。然而，戰後日本實證主義史學研究卻存在著“禁地難入、過猶不及、以假害真”的三重困境。<sup>②</sup>其中，“以假害真”的歷史闡釋模式尤為盛行。雖然“大部分的日本歷史研究者堅持追求史料的真實性，但在歷史觀上卻常為時局左右，罕能堅守實證主義歷史觀。”<sup>③</sup>因民族意識形態的羈絆與迎合國家歷史認識的需求，日本學者總是有意無意地迴避探討重要的歷史問題，電音閤位，以“實證”為幌子不斷為侵華翻案，學術政治化現象日趨嚴峻，辯護式實證研究範式逐漸興起。

細谷千博首開戰後辯護式實證研究之先河，認為日本之所以打破華盛頓體制，發動戰爭，雖然有蘇維埃革命外交及日本反華盛頓體制勢力抬頭的影響，但最終迫使日本打破華盛頓體制的束縛、掙脫軍縮條約限制的最大原因乃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sup>④</sup>細谷撓直為曲，斫方為圓，歷史認識嚴重錯位。白井勝美則一味頌揚幣原對華外交的“絕對不干涉主義”。<sup>⑤</sup>清水秀子認為日本的對外擴張是正確的，華盛頓會議不過是美英重返東亞後對日本的戰後總清算，日本外交在美英的遏制與強壓下被迫進行自我修正。<sup>⑥</sup>而實際上，日本“被迫”修正後的外交仍然是帝國主義侵略外交，清水秀子對日本的擴張本質缺乏正確認知，對華盛頓會議後日本推行“協調中的擴張”政策缺乏客觀認識。

松田弘貴認為，日本外交應順應時代特徵，遵循華盛頓體制的基本原則，摒棄舊外交的歷史局限，主動進行自我修正，方能走上正軌。<sup>⑦</sup>麻田貞雄對日本外交的認知與松田弘貴頗有出入，他從國家間政治與大國博弈的角度出發，認為1920年代國際環境的基軸乃華盛頓體制這一日美英三大國間的協調機制，日本外交在“舊”與“新”的夾縫中趑趄不前，在“理想的和平”、“反抗的孤獨”與“大國的協調”中進行理想與現實的交媾。麻田強調，雖然反華盛頓勢力在日本陸海軍中根深蒂固，但華盛頓會議後，日本主流外交最終轉向了國際協調主義。<sup>⑧</sup>麻田強調的協調乃日本與美英在中國利益分配上的協調，有意忽視了日本在“與國協調”中不斷加大對華擴張的史實，一味鼓吹華盛頓體制這一大國協調機制對東亞國際關係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然而，二戰後處於優勢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史家對華盛頓體制的評價並不高。小池聖一認為華盛頓體制並不是1920年代日本被國際社會孤立的發端，彼時日本作為軍事強國完全自立於英美，而作為經濟弱國又不得不依附英美，這才導致日本的對外政策隨之分裂為“亞洲門羅主義”與“英美協調主義”。<sup>⑨</sup>雖然戰後馬克思主義史觀在日本史學界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對華盛頓體制所起的積極作用及肯定評價並不多見，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國際關係解凍，馬克思主義史學式微，日本主流學界方才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實證主義史家們方才開始從“緊張緩和”的側面來關注華盛頓體制的作用。<sup>⑩</sup>但是其研究均對日本的對外擴張缺乏正確的認識，過度強調華盛頓體制對東亞國際關係的“積極作用”，細谷千博認為日本“新外交”模式必須以華盛頓體制這一大國間的合作體系為基礎，方能實現東亞國際政治新秩序的重建。<sup>⑪</sup>同期的三谷太一郎提出了“戰後外交轉換說”，服部龍二提出了“勢力圈外交連續說”。三谷認為一戰後的東亞國際關係正在從大英帝國治下的和平過渡到美國治下的和平，20年代乃這一世界霸權構造的轉換期，轉換期日本外交的基軸乃對美協調，為此才不得不改變傳統的對華政策。<sup>⑫</sup>但服部對三谷的“外交轉換說”提出了質疑，認為原敬內閣在新四國銀行團的組建過程中輕視了美英法三國的共同決定，從而導致威爾遜政權的對日不信任日漸加劇，致使一戰後初期的日美關係急劇惡化，日英矛盾也隨之凸顯，這才使美英竭力遏制日本，加大了同日本在中國的角逐力度，為擺脫國際孤立，日本外交必須巧妙地繼承“勢力圈外交”的傳統模式。<sup>⑬</sup>服部龍二所謂的“勢力圈外交”即結盟外交，只有與強者為伍，以雙邊同盟為對外擴張的國際支柱，才能不斷擴大對華侵略，攫取對華優勢地位。

## （二）專題事件上迴避式研究範式的形成

在一戰後初期對華經濟擴張一題上，三谷太一郎的“戰後外交轉換說”強調無論日本喜歡與否，都不能否認當時的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和黃金儲備量最大的國家。“滿鐵”與“東拓”這些對華經濟擴張國策公司的融資，必須依賴美國的扶持，無論是新四國銀行團的成立還是在華盛頓會議上的妥協，都有著美國對日資本輸出的深刻背景，日本的對華擴張必須轉向為對美協調下的隱性滲透。<sup>⑭</sup>副島卍照認為，由日本財界最頂端勢力組成的“日華實業協會”基於內閣建議修正了對華擴張戰略，標榜“不干涉主義”，要求“撤回”山東鐵道守備隊，無條件撤退漢口駐屯軍，但同時又大力讚揚日本政府對 1923 年中國回收旅大運動、排日運動、對日經濟絕交等的強硬鎮壓。<sup>⑮</sup>副島卍照既賣矛又售盾，一方面竭力迴避對“不干涉”下的“干涉”進行探討，大力鼓吹對華經濟擴張上的“戰略收縮”，一方面又極力頌揚原敬內閣對華的強硬態度及武力擴張。

關於“琿春事件”及間島出兵，林正和只著重交代了兩次“琿春事件”的經過，及中日兩國圍繞“琿春事件”的善後交涉，隻字未提日本收買豢養馬匪、自襲琿春分領館、出兵間島的政策意圖，有意迴避了日本自導自演、挑起事端、入侵間島、企圖長期駐兵東滿的事實。<sup>⑯</sup>佐佐木春隆對日本連續製造“琿春事件”的意圖避而不談，一味強調馬匪和“不法朝人”對琿春分領館的襲擊及日本在事件中的損失，<sup>⑰</sup>所述事實和所示數據與中方史料出入較大，對日本出兵間島、發動慘無人道的“庚申年大討伐”、製造駭人聽聞的“獐岩洞慘案”一帶而過。東尾和子大為淡化了日本製造事端入侵東滿的行徑，甚至有為日本出兵間島辯護的傾向。<sup>⑱</sup>

關於干涉北洋軍閥混戰一題，日本主流史學界主要以幣原的“協調外交”和政黨的“中立外交”為切入點，一味強調日本對中國內戰的所謂“不干涉”政策，對“不干涉”下的干涉視而不見。池井優提出了“雙重外交”<sup>⑲</sup>的概念，強調外務省對兩次直奉大戰皆“嚴守中立”，大力鼓吹幣原對華外交的“不干涉主義”。<sup>⑳</sup>關靜雄與波多野勝一味鼓吹幣原的“國際協調主義”，避而不談日本對中國內戰的積極干涉。<sup>㉑</sup>白井勝美強調幣原對 1925 年反奉戰爭“嚴守中立”，刻意迴避了日本軍政兩界對郭松齡兵變與國奉戰爭的積極干涉。<sup>㉒</sup>

在日本與郭松齡反奉的關係問題上，江口圭一雖對灤州兵變後日本軍部、關東軍及外務省的應對有過較為詳細的論述，但幾乎都是以《舊陸海軍關係文書》為史料基礎，並未使用外務省記錄、防衛省密記及《日本外交文書》等重要史料，對軍部與外務省從最初的意見分歧到最後的意見合流、適機出兵這一干涉政策的演變過程避而不談。<sup>㉓</sup>林正和以奉軍隨軍醫師守田福松的手記為切入點，對郭松齡起兵後，守田在張郭之間的斡旋調停進行了詳細論述，有意迴避了日本軍政兩界的積極干涉，更是隻字未提日本援張倒郭的政策意圖。<sup>㉔</sup>佐藤元英雖然陳述了加藤內閣的派兵決策與關東軍的警告這一事實，但認為日本政府出兵奉天僅為保護在滿日人，對日軍的在奉行動極為自制，竭力為幣原的“不干涉主義”進行“實證”辯護。<sup>㉕</sup>關靜雄一邊高唱幣原外交的“不干涉主義”，提出了“援奉否定論”，一邊又極力強調滿蒙權益的重要性，提出了“滿蒙權益維護論”，認為日本出兵奉天僅僅是為了維護滿蒙權益不得已而採取的“自衛之策”，完全否定了日本軍政兩界對反奉戰爭的干涉史實。<sup>㉖</sup>波多野善大則以俄國革命後東北亞國際關係的演變為切入點，把奉張（作霖）與郭（松齡）馮（玉祥）的對立歸演為日蘇鬥爭激化的必然結果。<sup>㉗</sup>雖有一定新意，但有偏離史實之嫌。

在干涉國民革命與北伐戰爭一題上，日本學者更是以偏概全、削觚為圓，造成了歷史闡釋及歷史認識的雙重混亂。衛藤沈吉認為廣州國民政府的反帝運動破壞了幣原對華“友好外交”好不容易才結出的果實，田中義一藉機推翻了幣原外交，採取對華積極政策，以武力干涉北伐。<sup>㉘</sup>馬場明認為田中內閣出兵山東僅僅是為了保護日僑，其對北伐持鮮明的支持態度，出兵後仍嚴格約束日軍行

動,實行所謂的“對華協調”,後因北伐受挫,才擬撤軍。<sup>29</sup>馬場明以“實證”為幌子篡改歷史,竭力宣揚田中內閣對北伐的“有力支持”。大山梓從日本海軍軍艦外務令及保護日僑的觀點來考察南京事件,強調遣外海軍所謂的“協調立場”及“協調職責”,大力鼓吹幣原外交的“協調主義”,刻意迴避了遣華海軍在“南京事件”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sup>30</sup>臼井勝美則避談田中內閣對北伐的干涉,極力為日本出兵山東、射殺國民革命軍、製造“濟南慘案”等進行“實證辯護”。<sup>31</sup>從衛藤沈吉到馬場明,從大山梓到臼井勝美,這些所謂的“實證主義史家”一面迴避探討日本對中國內政的積極干涉,一面竭力為日本軍國主義樹碑立傳,從而形成了辯護式與迴避式並立的二重實證研究範式。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也有少部分日本學者能夠謹守實證主義史觀,進行理性的歷史闡釋和歷史書寫。藤井昇三對華盛頓體制下日益高昂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給予了某種程度的理解和肯定,對日本干涉中國內政有一定程度的批判。<sup>32</sup>井星英在《昭和初年山東出兵問題點》系列文中較為客觀地論述了日本軍部的好戰性、濟南事件的起因,在日軍謀殺外交人員蔡公時等問題上的立場較為客觀。<sup>33</sup>黑澤文貴也對日本的舊外交和東亞政策提出了一定程度的批判。<sup>34</sup>但日本主流史學界能理性評價日本侵華史實的學者並不多見,大部分日本學者都具有殖民史觀,師心自用,肆於人上,其所建構的闡釋模式完全脫出了歷史評價的普遍性範疇,致使荒謬的歷史認識獲得了生存空間,客觀的歷史闡釋難以彰顯。

## 二、美英學界的宏觀考察範式

美英學界並無日本侵華史的專題研究,現有成果主要以美、英、日等大國在遠東國際關係上的外交互動以及在中國問題上的利益協調為研究對象,對1920年代的遠東國際關係、大國博弈、美日關係、英日關係以及日本與英美的協調路線等進行了宏觀考察,但並未對該時期的日本侵華史展開過實證性的專題研究。

日裔學者入江昭屬於美國史學界研究美國與東亞關係的年輕一代。此前,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賴世和(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歐內斯特·R. 梅(Ernest R. May)以及多蘿茜·伯格(Dorothy Borg)等已經耕耘多年,在美亞關係史的研究上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入江有自己獨特的優勢,能夠熟練使用英、日、漢三種語言進行跨語系研究,這一文化“混血兒”的特質使入江具有了較為寬廣的國際史視野,對國際關係的文化解釋獨闢蹊徑,從而奠定了作為美國當代最傑出的國際關係史家之一的學術地位。入江在《帝國主義之後:1921~1931年對遠東新秩序的探索》一書中構建了一個遠東國際關係的解釋框架,開創了運用多國檔案及多種民間史料來研究日、美、英對華政策的範例,對1920年代尤其是北伐戰爭時期日、美、英對華交涉重心的南移戰略進行了論述。入江認為1920年代日本對華政策的核心乃維護滿蒙權益、加大對北洋政府的外交攻勢、密切關注廣州國民政府的北進戰略及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國共合作北伐後,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摸准了國民黨派系鬥爭的脈搏,伺機利用了“溫和派”與“激進派”的矛盾,及時確立了“促蔣反共”之策,勸說美英放棄了制裁蔣介石的行動,促蔣發動了“四·一二政變”。<sup>35</sup>但入江又斷言沒有任何列強對“四·一二政變”產生過積極的催生作用,堅稱“沒有根據指責美國政府支持或慫恿蔣介石發動政變,美國駐華使領館人員對‘四·一二政變’幾乎一無所知。”<sup>36</sup>這實乃以己之矛攻己之盾之言。

雖然費正清稱入江“並無文化偏見,具有超越文化界限的世界眼光,使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在審視歷史記錄的時候,不擔心把人類整體的利益置於任何特定的國家利益之上”,<sup>37</sup>入江本人也宣稱“歷史學家應該超越自身的文化意識,突破美國固有的概念框架和意識形態霸權的束縛”,

立志於推進對外關係研究的“去民族化”和“國際化”，但入江並未真正做到“超越國家層面的分析而把整個世界視為研究的對象”。<sup>38</sup>入江在《戰間期的歷史意義》一文中，對一戰後初期日本外交的戰略轉向、參加華盛頓會議的“試金動機”、日本內閣及外務省圍繞參會與否而展開的爭論以及最終形成的參會對策等進行了詳細論述，從“戰爭與和平”的角度對 1920 年代的時代特徵進行了定義：就洛迦諾體制與華盛頓體制而言，國家間均勢的基點乃軍縮；和平的基礎乃發達國家間的政治協調與經濟依存，主張歐美領導者應該努力維持國際新秩序，從而努力構建國際及國內政治新結構。<sup>39</sup>入江把美國化作為 1920 年代的體制標準，從大國主導國際秩序的視角來看待作為國家間均勢這一傳統政策的華盛頓體制和日本的國際協調主義，過度強調大國間的相互依存與協調，忽視了依存中的衝突與協調中的擴張，有鼓吹大國霸權之嫌。

美國歷史學家沃爾特·拉費伯爾(Walter Lafeber)認為日本對膠東、遼東半島等地不遺餘力地進行資本輸出，在一戰後初期獲得了對華借款的壟斷權，但美國在 1920 年聯合英法組建了新四國借款團，實行新的門戶開放政策，暫時遏制了日本的對華擴張，華盛頓會議使軍事上、經濟上處於劣勢的日本不得不依附美國。<sup>40</sup>1920 年代美國的經濟實力首屈一指，可謂“沒有哪個國家沒有感受到美元的力量，也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在重要關頭可以把美國排除在考慮之外。”<sup>41</sup>沃爾特對美國治下的和平大加褒揚，強調美國時代來臨後日本外交被迫進行戰略收縮的無奈，忽視了日本在收縮中滲透、在協調中擴張的史實，過分誇大了華盛頓體制對東亞國際關係的“積極作用”。

伊安·H·倪士(Nish Ian Hill)乃英國史學界從事日本外交史、日英關係史研究之翹楚，在日本外交史及日英同盟研究上頗有建樹。<sup>42</sup>以伊安為首的研究團隊利用日、英、美三國檔案，對 1919 年巴黎和會到 1943 年大東亞會議期間日本對外政策的演變軌跡進行了宏觀考察，對幣原外交迴避國際敵對關係的“國際協調主義”給予了一定的肯定，就日本在英美回歸東亞後被迫進行戰略收縮、暫時依附英美的本質訴求進行了論述，提出日本外交由“舊”向“新”轉變的本質乃實力不濟時的戰略蟄伏，終極目的仍是推行大陸政策，達成對外擴張的國家目標。<sup>43</sup>

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在《20 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係研究導論》一書中提出了國際政治學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權力的觀點，戰間期只是兩次世界大戰間短暫的戰爭過渡，前 10 年充滿夢想期待，後 10 年轉入死寂，烏托邦是虛無的，如果不具有對現實的影響力，也就不具備對疆域的影響力，權力永遠是一切政治活動的主要因素，沒有權力就沒有道德。<sup>44</sup>卡爾奠定了現實主義學派的基礎，但又提出了反現實主義的言論，米歇爾評價《20 年危機》乃矛盾綜合之具化，是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之融合。<sup>45</sup>

雖然美英學界對 1920 年代遠東國際關係的宏觀考察範式已初具雛形，但並無日本侵華史的專題研究。入江昭的研究起步較早，1960 年代美國外交檔案的陸續開放為其深入研究美國的對外政策及美外關係提供了巨大便利，但日本軍政檔案尚未開放，入江雖然罄盡所能，用了能用的一切日方檔案，但佔比不大，這就註定了其研究焦點仍是美、英、日等大國在中國利益分配上的外交博弈。伊安團隊亦以英美檔案為主，日本防衛省密記、外務省記錄等核心檔案的使用率較低，研究對象仍以大國間的外交互動及英、美、日等大國在中國問題上的協調為主。

顯然，戰後美英學者的研究主要是從華盛頓體制與大國利益分配的角度來解釋遠東國際關係，他們認為華盛頓體制這一大國合作的殖民體制是合法的、有效的，合其利則揚，不合其利則貶，根據國家利益的訴求變化不斷調整遠東國際關係的解釋框架，從而使大國治下的“和平理論”合理化。正如吉爾平所說那樣：“同羅馬治下的和平一樣，英國治下的和平與美國治下的和平確保了一種相

對和平與安全的國際體系,英美創造並確保了國際經濟秩序的‘自由規則’。”<sup>46</sup>顯然,戰後的美英學者對華盛頓體制的侵略性質與大國利益分配的本質並無清醒的認識,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強國心態來解釋遠東國際關係與國際秩序,對華盛頓體制的殖民性質與帝國主義性質缺乏深刻反思。

### 三、國內學界片段散碎的個案研究

迄今為止,國內學界尚未系統使用日本軍政兩界的原始檔案對 1920 年代的日本侵華史展開過深入的實證研究。在專題研究上,因史料欠缺及研究人員不足等諸多因素,只在可行的範圍內盡可能利用能收集到的日方片段史料及中方文獻進行了零星散碎的個案研究,支撐史料不足,缺乏說服力。在宏觀考察上,雖有不少學者對近代以來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軌跡做了通史性的建構鋪陳,但大都以二手文獻及非核心史料(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及《外務省の百年》)為闡釋基礎,《日本外交文書》、《外務省記錄》和《防衛省密記》等核心檔案僅為偶見之點綴,並未深入挖掘日方軍政檔案。且研究時間跨度過大,研究問題較為宏大,雖然對近代以來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進行了長時段的貫通性思考,在闡釋近代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軌跡上有著比較宏觀的通史性的引領作用,所提供的知識與見解也易於傳播和領會,亦有助於歷史教益的汲取,但微觀實證與個案研究並不詳實,似有淺嘗輒止之嫌,諸多重要的歷史問題仍模糊不清,長期留存。<sup>47</sup>

在日本與中國軍閥的關係問題上,婁向哲在《日本與直系軍閥》一文中對比了日本軍部特別是關東軍對直系持有的極強戒心與外務省對吳佩孚較為柔軟的拉攏政策,剖析了軍部和外務省對直系採取不同政策的分歧和爭論。<sup>48</sup>李明在《奉系軍閥的形成與日本》一文中剖析了張作霖對東三省的統一過程及逐鹿中原的野心,論述了日本對張作霖、張學良的人物觀及對策,揭示了日本擬把張作霖培植成新的在華代理人、借奉張之手擴大對華侵略的政策意圖等。<sup>49</sup>

對於日本與北洋軍閥混戰的關係問題,學界主要以國內政治與戰爭過程為研究對象,鮮見日本干涉之新論。來新夏《北洋時期的三次軍閥戰爭》(長春:《社會科學戰線》,2008 年第 9 期)、陳長河《從檔案看 1922 年的直奉戰爭》(北京:《軍事歷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及《從檔案看 1924 年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北京:《軍事歷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叢曙光《兩次直奉戰爭結果迥異之剖析》(瀋陽:《遼寧大學學報》,1994 年第 4 期)等文僅從國內政治的角度論述了直系與皖奉兩系之戰,對日本干涉直奉大戰並未展開專題研究。婁向哲在《北洋軍閥與日本》一書中提出了日本軍政當局援奉抗直以維護滿蒙權益、積極干涉反奉戰爭的觀點,也使用了《舊海軍關係文書》與《密大日記》的部分資料,但文獻使用並不規範,出處不詳,且無文件名與頁碼,無法循查該檔的具體內容。<sup>50</sup>拙文《第二次直奉戰爭時期日本策反馮軍始末》嘗試系統運用日本軍政兩界的原始檔案,對日本利用直系內訌、通過駐華軍政組織的間諜活動成功策反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進行了詳細論述。<sup>51</sup>

在日本干涉 1925 年反奉戰爭一題上,國內學界現有成果大都著眼於郭松齡反奉,尚未對三大反奉戰爭進行有機整合,只在可行的範圍內盡可能利用能收集到的日方片段史料及中方文獻進行了零星散碎的個案考論。鄭智文《從軍事角度重看 1925 年郭松齡反奉》一文偏重於敘述張郭戰爭之經緯,並未涉及日本之干涉。<sup>52</sup>顧明義《郭松齡事件與日本》一文認為日本在郭松齡反奉初期曾經在援張還是援郭上躊躇不決,後因郭並不願滿足日方要求,日本最終決定援張,雖有新意,但並無支撐材料,推理路徑稍顯簡單。<sup>53</sup>張安慶《郭松齡倒戈反奉事件初探》一文雖然論及了日本對郭松齡兵變的干涉,但並無日方史料的支撐。<sup>54</sup>高紅霞《郭松齡倒戈失敗剖析》一文認為郭松齡兵敗並非日本干涉,而是不願與友軍合作及性格缺陷所致,日本出兵僅為一個催化劑,雖有一定新意,但並未深

人挖掘日方原始檔案，無意中忽略了日本從本土及朝鮮出兵對破壞反奉戰線所起到的巨大作用。<sup>55</sup>拙文《日本軍部干涉郭松齡兵變始末》對日本軍部從“分段干涉”到“全面干涉”的政策演變，以及關東軍、北支駐屯軍、獨立守備隊等駐華日軍的及時干涉等做了系統考察，揭示了日本軍部直接出兵干涉中國內戰的本質訴求。<sup>56</sup>

在中日共同研究層面，2006年12月始，中日兩國學者開始了歷時三年的中日關係史共同研究，於2010年1月公布了第一階段的共同研究報告，這是中日兩國第一次根據政府間協議進行的共同歷史研究成果，2014年10月，共同研究報告書在中日兩國同時出版。<sup>57</sup>圍繞“日本的大陸擴張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這一專題，日本學者服部龍二認為，在華盛頓體制下，列強在華均勢得以維持，日本的大陸政策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與美英的協調成了日外關係的出發點。但在中國收回國權走向統一之際，日美英的對華政策出現了衝突，大國秩序構想開始分化，日本對東亞政治格局及列強在東亞的利權博弈判斷失誤，從而走向了亡國之路。<sup>58</sup>中日學者的學術環境不同，經歷與文化背景各異，對史料的掌握與理解不一，即使是面對同樣的史料，在思維邏輯、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差別。<sup>59</sup>日本學者側重於具體事件的經緯陳述，分析事件的客觀原因及決策過程，強調中日間不僅僅只是戰爭，還存在各種各樣的選擇性與可能性。<sup>60</sup>儘管如此，中日雙方發表的共同研究成果，在影響中日關係最敏感的基本問題上取得了比較一致的觀點。<sup>61</sup>然而，該共同研究的重心仍為1930年代的中日戰爭，對1920年代日本局部侵華的諸多專題事件並未展開系統的實證探索。

國內學界之所以尚未對1920年代日本侵華史展開系統的實證研究，用李劍鳴先生的話來說，是與研究人員不足、難以得到本土資源的有力支持、文獻資料嚴重欠缺、學術積累單薄、本土理論貧乏有著分不開的關係，這些因素長期制約著外國史研究這一學科的學術性成長。<sup>62</sup>在外國史研究上，“無論是學科範圍的廣度，還是專題研究的深度，也無論整個世界史學科對世界學術的貢獻，還是單個學術成果的世界影響，我國世界史研究的水平與外國相較還有相當大的差距。”<sup>63</sup>顯然，作為外國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史研究特別是1920年代日本侵華史的實證研究，國內學界的學術貢獻仍甚為欠缺。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檔案史料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大幅的數字化和縮微化，制約中日關係史及日本侵華史研究的資料瓶頸已被基本突破，但1920年代日本侵華史的專題研究仍被有意無意忽視，學界關注的重點仍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的抗戰史研究，以及戰時日本侵華決策等方面的史料研究。<sup>64</sup>

#### 四、1920年代日本侵華史料利用與建設的反思

眾所周知，歷史研究發端於原始資料，誠如英國歷史學家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所說：“歷史學的出發點不是假設而是事實，即呈現於史家之前觀察到的事實。”<sup>65</sup>科林伍德所指的事實即歷史研究的對象，也就是原始的檔案史料。“歷史學就意味著闡釋”<sup>66</sup>，缺乏原始資料的歷史闡釋無異於空中築樓，無基可夯。史家在進行歷史闡釋的時候，“在找不到原始資料的地方，便什麼也做不了。”<sup>67</sup>一方面，因時代更替及戰火政亂等客觀原因，檔案史料難以“全面”掌握。但另一方面，檔案史料不足的現實性勢必帶來歷史評價的相對性，從而造成史家在構建和還原“歷史事實”時面臨各種質疑與詬病。因對1920年代日本侵華軍政檔案的收集不足，在進行專題研究時必然會存在許多模糊不清的領域，對日本軍政高層在制定侵華政策時的若干政治活動和決策過程缺乏較為清晰的認知，難以理清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軌跡，對日本軍政兩界在侵華策略和干涉手段上的分歧與爭端等細節亦會把握不全，甚或在一些自視瞭解的傳統研究領域也將產生諸多盲區，這不僅會導致對

史料的誤讀,也會導致對史實的誤解。一手史料的獲得性障礙,最終使以二手資料為闡釋基礎的歷史書寫產生了不可彌補的依附性缺陷,這一缺陷不可避免地使其構建的闡釋模式和解釋框架脫出了實證史學的原生性範疇。

對史家而言,真實的史料就是未被修改過的文獻記錄,只有以真實的史料為基礎,方能理性地闡釋和保護“過去”。因歷史觀的限制,日本的一些史料彙編並未真實地記錄“歷史事實”。如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所編《昭和三年支那事變出兵史》及“中支被難者聯合會”所編《南京漢口事件真相:揚子江流域邦人遭難實記》等“史料”嚴重誇大日人在“南京·漢口事件”中於長江流域等地的被害情況,選擇性地記錄部分“過往”,企圖嫁禍中方,以使其山東出兵合法化。而不少日本學者在進行“實證”研究時,往往以這些尚待考證的史料彙編為闡釋基礎,以“部分過往”代替“真實過往”。雖然“富有爭議性的事實才是真實的事實”<sup>68</sup>,但所有的事實“無一例外都是歷史學家認識主觀性與歷史事實客觀性相結合的產物”<sup>69</sup>,而日本學者往往以一些荒謬難稽的“實證”和“富有爭議的事實”為幌子來歪曲和篡改歷史,“部分研究甚至導向了錯誤的方向,並成為日本右翼歪理邪說的所謂‘學術依據’”<sup>70</sup>。對檔案史料的片面性、選擇性利用,必然導致“實證史家”的書寫模式陷入狹隘的史料理解與錯誤的歷史闡釋之中,難以揭示真正的歷史細節。

雖然戰前日本侵華軍政檔案一部分毀於戰火,一部分流失於海外,但大部分史料仍然完好無損地保存了下來。檔案文獻的豐富,不僅使研究者可以直接使用充足的一手史料,還可以借助於多國檔案進行史料的甄別和考證,從而提高歷史敘事的準確性和歷史解釋的豐富性。<sup>71</sup>近年來,中日兩國在檔案史料的建設上取得了巨大進展,亞洲史料中心的全面開放以及外務省外交文書的數字化與在線化,使日方史料的收集進一步易化,琉球大學、滋賀大學、神戶大學等高校的附屬圖書館以及北海道立圖書館與文書館也開放了部分在線資源,但這些在線資源僅僅是日本侵華史料的一部分,還有相當一部分檔案史料保存於東京外交史料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國立公文書館、國立國會圖書館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等。另一方面,雖然近年來“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係文獻數據平臺”以及中外相關抗戰數據庫的建設均在不斷提高和豐富,但大都為1930年代的抗戰史料,1920年代的日本侵華史料仍較為稀缺。很多珍貴的民國檔案要麼毀於戰火,要麼藏於台北“中研院”(內地學者赴台查檔難度較大),部分遺檔散存於各地方檔案館(局),有些地方檔案館(局)出於各種考慮,至今仍未開放相關的民國檔案。民國檔案的欠缺,必然導致學者無法通過中日檔案的對比印證來甄別日方史料的真偽,訂正訛誤,駁斥日本學界的種種謬論,這些因素使得1920年代的日本侵華史料建設仍然任重而道遠。

“歷史研究並不是對過去的研究,而是對過去留存至今的歷史痕跡的研究。”<sup>72</sup>1920年代乃日本全面侵華的準備期,侵華事實之所以客觀存在,不僅在於當下歷史研究中所延展下來的歷史痕跡,更在於檔案史料中的那些“真實過往”,檔案史料對學者重新建構歷史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迄今為止,國內鮮有學者嘗試對該時期的日本侵華史進行系統深入的實證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檔案史料的蒐集及解讀難度過大。

雖然日本已陸續公布了戰前檔案,但因1920年代日本侵華軍政檔案的收集、整理、考證等工作量繁雜巨大,加之該時期的史料大都以古日文或半古半白的文字成文,日本軍政首腦在制定政策、發布指令、傳達訓示時大都採用行書或草書行文,字跡潦草,其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又經檔案持有部門的多次縮微複製,字跡愈發模糊,辨識度降低,使用難度增大,導致史家在考辯史料的“真實語境”時面臨更大的困局。另外,在特定歷史事件(諸如“瑯春事件”、“南京事件”、“漢口事件”、“濟



南事件”等)的史料記載與事實呈現上,日方檔案所記錄的數據與中方史料出入較大,學者擬通過雙方檔案對比,準確統計數據、規避訛誤、考證史實難度也較大。

因此,如何加強史料建設、形成系統的史料庫與數據庫,如何全面收集、整理日方業已公布的史料,在編譯與研究過程中如何考證史料是否真實地記錄了“歷史事實”,如何甄識史料的“真實語境”與“虛假語境”,如何通過辭面上的“言內之意”準確詮釋辭面下的“言外之意”,如何正確解讀日本軍政高層制定政策時的本質訴求和政治意圖,如何釐清日本軍政兩界侵華政策的演變過程,對形成該時期歷史闡釋的價值體系和歷史書寫的話語體系,都具有極其重要的觀照和奠基作用。

## 結 語

綜上所述,因歷史觀的制約、政治影響等客觀原因,以及日本右翼集團與保守勢力在歷史認識問題上不斷製造障礙,諸如岸信介、佐藤榮作、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等日本政治家並未尊重史家的判斷,對歷史問題進行不負責任的表態,媒體又不斷煽風點火,斫方為圓,這些負面因素致使日本主流史學界在歷史問題上並無原則性判斷的智慧,缺失客觀公允的歷史記憶,不能脫出學術政治化“另類書寫”的怪圈,大部分學者所構建的歷史認識及評價尺度並不能理性地進行歷史闡釋。美英史家基於大國利益訴求及利權博弈所給出的歷史評判並非蓋棺之定論,對華盛頓體制下的遠東國際關係解釋框架的構建,以及日、美、英在中國問題上的協調等歷史事實的認識和界定亦非確鑿之辭。而如何重新構建那些被日、美、英學界所忽略、遮蔽甚至有意剔除的歷史事實,對其進行合乎理性的整理與書寫,是國內學界當下必須直面的難題。

首先,應培養該領域的高端研究人才,以全面推進該時期日本侵華史的微觀實證和宏觀考察。其次,要全方位開展兩次大戰間日本侵華軍政檔案的收集、整理、翻譯及考證工作,最終建成系統的史料庫、數據庫,加大本土資源的支持力度,促進中方相關史料的進一步開放,以通過雙邊或多邊檔案的對比考證,訂正日方部分檔案的訛誤,駁斥日本學界的種種謬論。只有將該時期日本侵華史的實證研究全面推向深入,方能認識和揭示該時期中日關係史及東亞國際關係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使該時期的歷史闡釋獲得理性真義與客觀建構,為全面侵華史與抗戰史的研究提供有益補充。無論是在實證操作還是範式建構層面,這無疑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①永原慶二:《永原慶二著作選集》(第九卷),東京:吉川弘文館,2008年,第126頁。

②詳參張躍斌:《實證主義在日本的困境和沒落》,北京:《當代世界》,2016年第12期。

③丁諾舟:《日本實證主義史學的困境與出路》,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17年第10期。

④細谷千博:《兩大戰間の日本外交》,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筆者按:在對整本書或整篇論文的觀點進行概括而非具體引用的情況下,因頁碼範圍過於寬泛,故不再標注具體頁碼,下同。

⑤白井勝美:《中国をめぐる近代日本の外交》,東京:筑摩書房,1983年。

⑥清水秀子:《山東問題》,東京:國際政治56《1930年代の日本外交》,1976年。

⑦⑩松田弘貴:《戦間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対外行動の変容—「旧外交」と「新外交」の境界線上で—》,東京:《政治學研究》,40号,2009年。

⑧麻田貞雄:《ワシントン會議と日本の対応》,入江昭、有賀貞編:《戦間期の日本外交》,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4年。

⑨小池聖一:《“ワシントン体制”理解の変遷 戦後日本近代史の史學的一考察》,東京:《中央史學》,第21号,1998年,第49~50頁。

⑪細谷千博:《ワシントン体制の特質と変容》,細谷

- 千博、齊藤真編：《ワシントン体制と日米関係》，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第3頁。
- ⑫三谷太一郎：《増補日本政黨政治の形成原敬の政治指導の展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年，第11頁、第308頁。
- ⑬服部龍二：《東亞國際環境の変動と日本外交1918-1931》，東京：有斐閣，2001年，第5~6頁。
- ⑭三谷太一郎：《ウォール・ストリートと満蒙》，細谷千博、齊藤真編：《ワシントン体制と日米関係》。
- ⑮副島田照：《一九二〇年代のブルジョアジーの中国政策》，東京：《日本史研究》，151/152，1975年。
- ⑯林正和：《琿春事件の経過》，東京：《駿台史學》19，1966年9月。
- ⑰佐佐木春隆：《琿春事件考》，東京：《防衛大學校紀要》，第39/40/41輯上中下，1979~1980年。
- ⑱東尾和子：《琿春事件と間島出兵》，東京：《朝鮮史研究會論文集》14，1977年3月。
- ⑲筆者按：池井優所謂的“雙重外交”，即日本軍部和外務省在侵華策略及手段上各行其是、各執一端，軍部主張積極援奉以武力干涉中國內戰，而外務省則主張通過外交及政治手段進行干涉。
- ⑳池井優：《第一次奉直戦争と日本》及《第二次奉直戦争と日本》，栗原健編：《對滿蒙政策史の一面》，東京：原書房，1966年。
- ㉑関静雄：《幣原外交と第二次奉直戦争》，奈良：《帝塚山大學教養部紀要》第44号，1995年；波多野勝：《憲政會外交から幣原外交まで—憲政會の外交方針と第二次奉直戦争》，東京：《法學研究》，第73卷第1号，2000年。
- ㉒白井勝美：《“幣原外交”覚書》，東京：《日本歴史》，第126號，1958年。
- ㉓江口圭一：《郭松齡事件と日本帝國主義》，東京：《人文學報》，第17号，1962年。
- ㉔林正和：《郭松齡事件と一日本人—守田福松醫師の手記「郭ヲ諫メテ」について》，東京：《駿台史學》，第37号，1975年9月。
- ㉕佐藤元英：《郭松齡事件をめぐる外交と軍事》，東京：《中央大學文學部紀要》(251)，41~71，2014。
- ㉖関静雄：《幣原外交と郭松齡事件》，奈良：《帝塚山大學教養學部紀要》(54)，1~35，1997。
- ㉗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軍閥の研究》，東京：河出書房，1997年，第418~419頁。
- ㉘衛藤瀋吉：《朝鮮・中国の民族運動と國際環境》，東京：巖南堂，1959年。
- ㉙馬場明：《第一次山東出兵と田中外交》，《日中關係と外政機構の研究》，東京：原書房，1983年。
- ㉚大山梓：《南京事件と幣原外交》，東京：《政経論叢〈明治大政治經濟研究所〉》40-3/4，1971年。
- ㉛白井勝美：《濟南事件交渉経緯》，東京：《外交史料館報》3，1980年。
- ㉜藤井昇三：《平和からの解放》，《日本政治學會年報・國際緊張緩和の政治過程》，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
- ㉝井星英：《昭和初年における山東出兵の問題点》1-4，東京：《芸林》28-3/4，29-1/2，1979年8月。
- ㉞黒沢文貴：《兩大戦期の体制変動と日本外交》，東京：《外交時報》，第1345号，1998年2月。
- ㉟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89-159.
- ㊱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7, pp. 158-159.
- ㊲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introduction by John King Fairbank, p. x.
- ㊳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No. 1, Feb. 1989.
- ㊴入江昭：《戦間期の歴史的意義》，入江昭、有賀貞編：《戦間期の日本外交》，第9~14頁。
- ㊵ウォルター・ラフィーバー(Walter LaFeber)：《米國極東外交の主題》，平野健一郎訳，細谷千博、齊藤真編：《ワシントン体制と日米関係》。
- ㊶Edwin L. James, *Our World Power and Moral Influence*, *The International Digest*, Vol. 1, October 1930.
- ㊷Ian Hill Nish,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69-1942: Kasumigaseki to Miyakezak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7);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The Diplomacy of Two Island Empires, 1894-1907* (London · New Delhi · New York · Sydney:

Bloomsbury, 1966); *Alliance in Decline: A Study in Anglo-Japanese Relations, 1908-1923* (London · New Delhi · New York · Sydney: Bloomsbury, 1972).

⑬ Ian Hill Nish,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Interwar Period*,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2.

⑭ 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⑮ Michael Cox ed., *E. H. Carr: A Critical Appraisal*, Hounds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2000.

⑯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44.

⑰ 如沈予《日本大陸政策史 1868-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臧運祜《近代日本亞太政策的演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米慶餘《近代日本的東亞戰略和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

⑱ 婁向哲:《日本と直隸派軍閥集團》,京都:《立命館法學》,188/189/190合併号,1986年。

⑲ 李明:《奉天派張作霖軍閥の形成と日本》,名古屋: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7-2,1987年。

⑳ 婁向哲:《北洋軍閥與日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

㉑ 陳太勇:《第二次直奉戰爭時期日本策反馮軍始末》,南京:《民國檔案》,2016年第4期。

㉒ 武漢:《近代史學刊》,第9輯,2012年。

㉓ 瀋陽:《日本研究》,1986年第4期。

㉔ 武漢:《武漢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㉕ 上海:《學術月刊》,1987年第12期。

㉖ 上海:《史林》,2019年第1期。

㉗ 中文版:步平、北岡伸一主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日文版:北岡伸一、步平編:《日中共同歷史研究報告書》,東京:勉誠出版,2014年。

㉘ 李鍾元、田中孝彥、細谷雄一編:《日本國際政治學:歷史中的國際政治》(第四卷),劉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98~99頁。

㉙ 步平:《歷史認識的交鋒與相互理解——關於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及研究報告》,北京:《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8期。

㉚ 庄司潤一郎:《「日中歷史共同研究」の展望》,東京:《防衛研究所ニュース》,2008年12月号。

㉛ 《筆談“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北京:《抗日戰爭研究》,2010年第1期。

㉜ 李劍鳴:《本土資源與外國史研究》,天津:《南開學報》,2003年第2期。

㉝ 王立新:《學術創新與21世紀的世界史研究》,北京:《光明日報》(歷史週刊),2000年3月24日。

㉞ 如徐勇、臧運祜主編:《日本侵華決策史料叢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尹建英、潘殊聞主編:《建川博物館藏侵華日軍家書》,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

㉟ ㊱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With Lectures 1926-1928*,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by Jan van der Duss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1994, p. 251; p. 369.

㊲ Edward Hallett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2, p. 26.

㊳ 劉北成、陳新:《史學理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83頁。

㊴ 王利紅:《試論科林武德的“一切歷史都是史學史”》,北京:《史學理論研究》,2016年第4期。

㊵ 張躍斌:《日本的近現代史研究:問題與挑戰》,北京:《史學理論研究》,2015年第4期。

㊶ 王立新:《從外交史到國際史:改革開放40年來的國際關係史研究》,北京:《世界歷史》,2018年第4期。

㊷ Geoffrey. R. Elton,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2, p. 8.

**作者簡介:**陳太勇,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日本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四川大學歷史學院世界史博士後科研流動站研究人員。成都 610065

[責任編輯 陳志雄]